



军政往事



房山良乡地区红色政权纪事

刘文江^{*}

房山、良乡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平西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平西解放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东部前沿地区，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房涿涿联合县等红色革命政权，领导了房山县、良乡县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大旗，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房涿涿联合县（1938年3月至1938年11月）

房涿涿联合县即房山、涿水、涿县联合县。1938年2月，

* 刘文江：房山区史志办原主任



邓华奉晋察冀军区命令，率三团（后改为六支队）由涞源向平西挺进，3月中旬到达平西。根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房涞涿工委和县政府。房涞涿联合县于1938年3月在涞水县的马水村成立，组成了中共房涞涿县工作委员会、房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房涞涿游击支队。辖涞水县七区（板城区）、涿县六区（三坡区，其中镇厂地区为民国初房山县辖区）、房山县五区（南窖区）和房山八区靠近三坡区的芦子水、东村等四五个村庄。约1个月后，县工委和县政府迁到桑园涧村。1938年5月，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四纵队，6月挺进冀东，工委书记和县府的人员也随军挺进冀东。

中共房涞涿联合县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杨春甫，第二任书记那恕。房涞涿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刘慎之，第二任县长佟旭野。

房良联合县（1938年5月至1941年6月）

房良联合县即房山、良乡联合县。1938年4月底，晋察冀军区五支队回平西接防。五支队到达平西后，根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从部队中抽调得力干部到地方，建立健全县政权，改造地方武装，新建了房良联合县。1938年5月初，五支队派杜伯华、郭方、贾嵩明、尚英等4人到房山五区抗日根据地筹备建县工作。5月5日，在长操村成立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5月8日，在长操村成立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组建了平西游击四支队（房良县大队），下分三个大队。



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主任郭芳。中共房良联合县委员会第一任书记郭强，第二任书记杨流萤，第三任书记赵然，副书记庄敬山。房良联合县参议会第一任议长赵然，副议长周硕臣。房良联合县第一任县长杜伯华，第二任县长刘介愚，第三任县长王天瑞。

昌宛联合县（1939年3月至1942年12月）

昌宛联合县即昌平宛平联合县。1939年2月，宛平县抗日根据地由斋堂地区扩大到永定河北昌平西部地区，宛平县遂改为昌宛联合县。昌宛县辖界西至灵山，东至现海淀区的北安河，北至现河北省怀来县的水峪口，南至现房山区的柳林水，共划为5个区。

中共昌宛联合县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杜存训，第二任书记宋恩庆（代），第三任书记梁波，第四任书记宋恩庆（代），第五任书记杜存训，副书记史梦兰。昌宛联合县政府第一任县长焦若愚，第二任县长章逮。

房涿涿联合县（1941年6月至1944年10月）

1940年秋，侵华日军大“扫荡”以后，房良联合县和涿涿联合县的根据地均缩小了。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冀热察区党委和平西地委的指示，于1941年6月至14日，房良、涿涿两县合并为房涿涿联合县，组成了中共房涿涿县委和县政府，分别驻在涿水县宋各庄村和悟空寺村，辖9个区。1941年



8月，侵华日军对房涿涿根据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大“扫荡”，根据地大部被敌人侵占，县委和县政府迁移到二区，分别住在后石门村和平峪村。根据地只剩下二区、九区和一区的几十个村庄。蒲洼、十渡、堂上等几十个村庄，当时不仅是房涿涿县的根据地，而且是昌宛县委和县政府暂住的地方，也是冀中十分区的战略后方。1944年3月底，平西地委和专署决定，将房涿涿县的八区（圣水峪、天开、长沟一带）、九区（蒲洼、霞云岭、南窖一带），划归昌宛房县，房涿涿县辖7个区。1944年10月，平西地委决定，撤销房涿涿县和昌宛房县，单建房山县、涿县和宛平县。

中共房涿涿联合县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杨流萤，第二任书记贾吉平，第三任书记赵然，第四任书记陈洪新。副书记赵然、陈洪新。房涿涿联合县参议会议长赵然，副议长周硕臣、邵荣轩。房涿涿联合县第一任县长王天瑞，第二任县长马志毅，第三任县长郝绍尧，第四任县长郝华亭。

昌宛房联合县（1942年12月至1944年10月）

昌宛房联合县即昌平、宛平、房山联合县。1942年12月平西地委决定，撤销昌宛联合县，建昌（平）宛（平）房（山）联合县。昌宛房联合县初建时辖6个区，包括四区（史家营，柳林水一带）、五区（陈家坟，河北一带）、二区（大安山一带）的一部分。1944年3月底，平西地委和专署决定，将房涿涿县八区（圣水峪、天开一带）、九区（蒲洼、霞云岭一带），



划归昌宛房县。原房涑涿八区划为昌宛房八区，房涑涿县九区划归昌宛房九区。

中共昌宛房联合县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杜存训，第二任书记杜春永。昌宛联合县参议会议长杜存训。昌宛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张获，第二任县长王天瑞。

平南办事处—平南县（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

平南办事处即大兴、宛平、安次、永清、固安、涿州、良乡办事处。1943年10月，成立中共大（兴）宛（平）安（次）永（清）固（安）涿（州）良（乡）工作委员会和办事处，也叫“平南”工委会和办事处，简称“七字工委”和“七字办事处”。平南游击队的活动已到达房山地区的窑上一带。1944年10月撤销平南办事处，设平南县。平南县四联区包括今房山区窑上一带。1945年3月撤销平南县，设大兴县和涿良宛县。

中共平南办事处工作委员会书记苏玉振。中共平年县委书记苏玉振。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平南县县长阎占彭。

涿良宛联合县委（1945年3月至1946年2月）

涿良宛联合县即涿州、良乡、宛平联合县。1945年3月，撤销平南县，建立涿良宛联合县和大兴县。涿良宛联合县隶属于冀中十地委、十专署，辖一区（涿县码头一带）、二区（良乡窑上一带）、三区（宛平县新立村一带）、四区（宛平县庞各庄、履磕一带）、五区（宛平县于堡一带）。1946年2月撤销。



中共涿良宛联合县委员会书记刘浩，涿良宛联合县县长马迅。

房山县（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

1944年10月，十一地委和十一专署决定，撤销房涿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设置房山县、涿县和宛平县。房山县成立后组成了中共房山县委和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分别驻十渡村和六渡村。辖区包括，原房涿涿县的二区（十渡、六渡一带）、七区（南白岱、镇江营、半壁店一带），原昌宛房县的八区（圣水峪、天开、黄出店一带）、九区（霞云岭、下石堡、南窖一带），共4个区。1945年1月，组建了了房山县大队。群众团体设有抗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等。1945年3月，县委和县政府迁到一区霞云岭村。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和游击区的工作进展，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开辟新地区，调整了区划，将原来的4个区调整为7个区。

中共房山县委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徐元甫（四十四团政委兼），第二任书记孙甫民，第三任书记王再田。副书记孙甫民。房山县县长谭惠民。

宛平县（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

1944年秋，北岳区形势好转，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日寇的据点逐步收缩到大的点线，根据地扩大。边区党委9月30日决定，撤销昌宛房联合县，设立宛平县、房山县。宛平县成立后，组成了中共宛平县委和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今史家



营乡、大安山乡及河北镇部分村隶属于宛平县。

中共宛平县委员会书记杜春，宛平县县长王天瑞。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反动集团就部署抢占军事要地。1945年8月25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抢占平津要地。孙连仲将原房山伪军稍加整编，授予“先遣军”称号。任命张德祥为房山保安团团团长，任命国民党房山县、良乡县党部负责人，建立国民党房山县、良乡县政府。依靠日本侵略者为非做歹的一大批汉奸特务和敌伪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的急先锋。以房山保安团张德祥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接连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中共房山、良乡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组织房良、良乡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房山县（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房山县除县城和周口店等重镇外，全部解放，解放区扩大。房山县委、县政府由霞云岭村迁到南窖村。全县辖8个区。1946年4月，县委、县政府迁到张坊村。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房山县国民党的军队对解放区疯狂进攻，平原地区大部分被敌占



领，四区、五区、六区和三区的一部分村庄变为游击区。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县委和县政府领导根据地的人民全力抗战，保卫胜利果实。1947年2月，平西地委决定将房山县七区划归良乡县。11月，又将房山县四区划归良乡县。房山县辖6个区。

1948年12月14日，七纵队二十旅解放房山县城，县委、县政府迁驻房山城内。同月，平西三地委决定，将良乡四区的全部（黄山店、周口店、城关一带）和二区（瓦窑头、夏村等）、三区（羊头岗、饶乐府等）的22个村庄划回房山县。房山县将新划回的地区，划为城关区和七区，房山县辖8个区。1949年4月，又将良乡三区（河北、磁家务一带）、五区（佛子庄、南窖一带）划归房山，改为房山八区和九区。至此，全县共辖10个区。

中共房山县委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王再田，第二任书记王宪，第三任书记刘祥庆，第四任书记崔乐春。副书记孟钺、刘德湘、崔乐春。房山县第一任县长谭惠民，第二任县长曹建国（代），第三任县长王建业，第四任县长杜恩霖。副县长曹建国、杜恩霖、宿光明。

良乡县（平汉铁路西）（1945年9月至1949年8月）

1945年9月，平西十一地委决定，建立良乡县，原宛平县六区、八区和房山县四、八两区大石河以东部分划归良乡县管辖。县委和县政府驻河北村，1946年初，迁到磁家务村。当时，良乡县辖4个区，125个行政村。1946年5月，驻房山、良乡



两县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占领了重镇坨里，二区、四区变成了敌占区。良乡县工委和县佐公署转移到大安山村。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47年2月上级决定，将房山七区（佛子庄、南窖一带）划归良乡县，11月又将房山四区（黄山店、长沟峪、夏村一带）划归良乡县。良乡县辖5个区。县委迁到佛子庄村。

1948年7月，良乡县工委改为良乡县委，县佐公署改为县政府，迁驻班各庄村。随着平津战役的开始，12月13日，良乡城解放。县委和县政府迁到良乡县城内。同月，上级决定，将良乡四区的全部和二、三区的一部分村庄划回房山县，铁路以东，小清河以西的南召、交道、官道、长阳等地区，均为良乡县所辖。据此，良乡又重新调整了区划，辖8个区。1949年4月，将三区、五区划归房山县。8月，涿良宛县撤销，又将窑上、任营一带划归良乡，时良乡县共辖7个区。

中共良乡县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王漫，副书记刘民。中共良乡县工委第一任工委书记田波，第二任工委书记刘民，第三任工委书记刘祥庆，副书记刘民。中共良乡县委第一任书记霍梁，良乡县第一任县长郝绍尧。良乡县第一任县佐郝绍尧，第二任县佐王蕴新，第三任县佐霍梁。良乡县第一任县长阁振峰。

宛平县（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

1945年8月15日，八路军解放门城地区，至此，宛平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史家营乡、大安山乡隶属于宛平县。1948年6月，县委、县政府再迁大台。1948年12月14日，



宛平县全部解放。

中共宛平县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杜春永，第二任书记刘文达，第三任书记刘鹤，第四任书记王建业，副书记郑林、刘鹤云、黄亮、吕连英、师守琪。宛平县第一任县长傅万睦，第二任县长吕连英，第三任县长杨怀清，第四任县长杨益民，副县长安宗印。

良乡县（平汉铁路东）（1946年2月至8月）

1946年2月，冀中十地委、十专署决定，撤销涿良宛联合县，建立涿县、良乡县、宛平县。辖3个区：一区（永定河以东、南北章客一带）、二区（永定河以西、小清河以东窑上、长辛店一带）、三区（南召、交道一带）。县委、县政府驻窑上和赵村。1946年8月，十地委、十专署决定将良乡县与宛平县合并为良宛联合县。

中共良乡县委员会（平汉铁路东）书记宋浩，良乡县县长陈震。

良宛联合县委（1946年8月至1947年10月）

良宛联合县即良乡、宛平联合县。1946年8月，冀中十地委、十专署决定将良乡县和宛平县合并，建立良宛联合县。辖五个联区，一联区（押堤）、二联区（新立村）、三联区（履磕）、四联区（南各庄）、五联区（窑上）。各联区均建立了区委区政府。1947年10月，十地委、十专署决定撤销良宛联合县建置，



重建涿良宛联合县。

中共良宛联合县委员会书记刘浩，良宛联合县县长马迅。

涿良宛联合县委（1947年10月至1949年8月）

1947年10月，冀中十地委、十专署决定，将涿县与良宛联合县合并，建立涿良宛联合县。辖四个区，河东一区（庞各庄、赵村一带）、河东二区（履磕、榆垓一带）、河西一区（窑上一带）、河西二区（码头一带）。1949年春，涿良宛联合县划归平西区，1948年8月，撤销涿良宛联合县，所属区域划归涿县、良乡县。

中共涿良宛联合县委员会书记赵明之，涿良宛联合县县长李景森。



抗战初期的一场阻击战

索 俐 赵思敬*

“我家在房山区青龙湖镇南观村。儿时便听说过村东骆驼鞍（明顶山）一带山梁和羊耳峪东北凤凰山（北大梁）一线曾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中央军阻击西进的日本鬼子，战斗了有 20 多天，终因死伤严重，最后退出阵地向西南收缩。”

“我家原有西房三间，北房三间，东面是一片石头堆。听老人说，东面废墟曾是 5 间东房，被中央军当作支前伙房。因出入人较多，招来了日本飞机。一颗小水缸似的炸弹投下后，五间东房顿时变为废墟，北房墙壁也被震裂变形，到 1964 年终于坍塌，不得不重新修缮。”

“记得 1963 年去羊耳峪上中学，我常用一个‘中央斗’带午饭。‘中央斗’是一侧带有内弧的扁圆铝制容器，上面有盖，因是当年中央军丢下的，所以叫‘中央斗’——是那时军人使用的一种饭盒。被炸东房的废墟、家里的‘中央斗’，使我对

* 索 俐：房山区燕山油化报原总编

赵思敬：房山区文联原秘书长



那场阻击战充满了好奇和深入了解的渴望……”

索俐回忆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假借“谈判”之际，完成了进攻平津的兵力部署。到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29军向南撤退。为全面阻击日军对西南的进攻，国民政府调整军力部署，组建了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等新建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刘峙，副总司令为孙连仲并兼任第一军团司令。第一军团下属三个师：分别是第27师，师长为冯安邦；第30师，师长为张金照；第31师，师长为池峰城。

关于发生在房山、燕山一带的这场阻击战，在《正面战场·七七事变》一书中，有一篇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团第27师第79旅参谋长徐宪章写的回忆录《明顶山、琉璃河、窦店战斗》。文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这场阻击战的经过。文中说，卢沟桥事变后，驻守在湖北孝感、应山一带的孙连仲第26路军第27师官兵，坐火车赶赴北京西南。

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连仲亲自带领第30师在房山西南高地，池峰城的第31师则重点布防在房山北部八十亩地、南观村、口头村西明顶山、七泉岭一带，第27师在琉璃河一带构筑防御阵地，拒敌南侵。

8月，大石河汛期刚过，水流湍急，河面开阔。8月初，战斗打响，双方武器装备水平悬殊，31师战士只能凭借射程较短的汉阳造步枪和少量机枪，与拥有飞机、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三八大盖步枪的日军进行殊死血战。在敌人炮火轰击、



飞机轰炸的惨烈情况下，31师伤亡巨大。关于国民党军在明顶山的这场阻击战，26军在战报中说：“31师本日之激战，极尽悲壮惨烈之境，山地多为岩石地，工事修筑难度极大，敌军轰炸中石砾反增强杀伤。”31师损失过大，自8月19日至26日，在1937年日军编辑的《支那事变画报》第五期上，有一篇《平汉战线：大房山占据》的专题报道。综合中日双方的战报得知，8月25日，日军20师团步兵78联队（小林部队）在火炮和航空部队的掩护下，猛攻口头村和七泉岭（口头村，指明顶山；七泉岭，明顶山南面山岭）。口头村国民党守军一个连伤亡惨重，不支后退，国民党援军到达后经激战不胜，下午两点阵地失守。七泉岭阵地国民党军几经争夺勉强又守住阵地，接着又与日军展开对明顶山的争夺。128团第一营血战半日伤亡过重，数次反击后最终阵地陷落。日军步兵78联队战报记录说：“敌军顽强抵抗，我军肉搏中死伤续出，在击退敌军数次夜袭后占领一线阵地，在向敌二线阵地进攻时夜袭，最终于8月26日1点占领了阵地。”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多次正面进攻也未能得逞。于是，狡猾的日军便利用坨里铁路，向31师西北侧翼迂回，并出动飞机、大炮，猛攻西北山头试图抢占西北凤凰山的制高点。若凤凰山被攻陷，日军就可以居高临下，对阻击日军池峰城部形成东西夹击态势。为此，31师请求火速增援，堵住进攻凤凰山的日军。

第27师88旅176团第三营营长仵德厚接到上级命令后，



火速率领全营 500 多名官兵急赴羊耳峪东北凤凰山 4057 高地阻击日军。仵德厚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37 年 8 月下旬，日军向羊耳峪凤凰山 4057 高地发起进攻。双方激战十余日，日军每天都要向高地发动四五次进攻，均未得逞。日寇的飞机擦着树梢飞行，对坚守阵地的三营以及支援三营作战的上店、羊耳峪村百姓实施了狂轰滥炸。仵德厚所率三营官兵伤亡严重，副营长赵志道负伤，七连连长阵亡。仅一天之中，电话兵就伤亡 3 人。近十天激战后，仵德厚所率三营 500 余人已伤亡大半。

1937 年 8 月 29 日，经过 20 多天的阻击，池峰城部和坚守 4057 高地的三营不得不撤出阵地。他们采取步步抵抗的策略，转移至歇息岗、迎风坡、西南高地乱石洞（今燕山公园电视塔山头）一线构筑工事继续抵抗。

据 1906 年出生的羊耳峪村民高玉福说，8 月的一天上午，他在双泉河西边靠北的自家玉米地除草，有三个日本兵从北大梁下来，不容分说拿绳子就把他捆上，押往北大梁。到了山顶朝山坡一看，有许多白色帐篷，跟水波浪似的。到了中午，日本兵开始吃饭。他们拿了一块毡子，往上倒了几把米饭，叫另外两个被绑的老百姓和高玉福跪在地上用嘴啃着吃。一个日本兵拿出一张图，问他们“阿城”在哪？高玉福说“不知道。”于是，鬼子兵又押着他们往上店村走，再从大楼沟南边的山沟到金陵，从金陵奔高家坡。高家坡北边有一片高粱地，高玉福怕鬼子到房山城把自己杀了，就捂着肚子跟押送的日本兵说：“我要拉屎。”说着指了指高粱地，日本兵点了点头。于是，



他钻进了高粱地，然后一阵猛跑。这一带地形他非常熟悉，很快回到了羊耳峪。至于那两个被日本兵押解的老百姓是死是活，就不得而知了。

据日本军方主办的《日支事变画报》记载，两名日本随军记者搭乘从南苑起飞的飞机飞临东流水村上空时，只见一个日本兵对着飞机挥动日本旗子，意思是说我们是自己人。日军飞机驾驶员却不由分说向地面投下了炸弹。日军记者急忙说：“那是自己人，你怎么还敢投炸弹？”飞行员说：“你看，你看，人没了吧？这些都是国民党军化妆的。”轰炸了东流水村之后，日军飞行员说：“不能在这耗太长时间，我们今天主要目的是轰炸羊儿峪（羊耳峪）。”于是飞到了羊儿峪上空。日军记者看到，这个村子有南北和东西两条街，呈丁字形。其实，这个观察并不准确，他们没有看到北街，因为北街比较短，许多国民党军正从村里往北边的山上转移。

日军抓来歇息岗村民，让他们在村东北面挖战壕。村民迟四爷曾跟孟凡立回忆说：“谁说小日本不怕死？我被迫给鬼子挖战壕，挖完之后就躲了起来。有一个日本鬼子，可能是当官的，他举着指挥刀大叫了几声，就是没人冲。你说他不怕死？等了好一会儿，日本兵才不情愿地走出战壕。”

据丁家洼村民说，住在他们村的一个班国民党军早起奔赴战场，中午回来时，战士扛着班长的一条大腿回来了。他说班长的身子都被日军飞机炸飞了，只好把这条腿安葬了，可见战斗的惨烈程度。直至9月16日，日军才突破阻击侵入房山城。



这表明，在北部高地失守的情况下，中央军仍然顽强抵抗了近半个月时间。之后，仵德厚带领三营剩余的 100 多人奉命退守娘子关一线继续战斗。

关于在凤凰山一带阻击日本鬼子的战斗，羊耳峪村和上店村的老人都有着深刻记忆。

原羊耳峪西街 93 岁的张振雄老人回忆说：那年他才 10 岁，记得日本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看到有中央军出入的房子就扔炸弹轰炸。他家后园有很多树木，一些中央军就躲在树林里。看到飞机轰鸣盘旋，母亲拉着他要往外跑。中央军见到后大喊：“老太太别跑，快藏下，有飞机轰炸……”话音刚落，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落在街对面朱先生的房子上，房子顿时炸飞了。朱先生是瓦井村人，在羊耳峪开了个药铺。好在他跑出了屋子才免遭一劫。羊耳峪十字街西北角的武家院子也遭到了轰炸，村民刘振邦的母亲便在轰炸中不幸遇难。

日军飞机所以轰炸村子，很大原因是村民帮助中央军运送补给、照顾伤员，为前线官兵做饭、送饭。

燕化退休职工，祖籍上店村的王江，讲述了凤凰山阻击战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从小便从母亲和前辈那里聆听了许多有关凤凰山阻击战的故事。参加阻击战的中央军指挥部设在上店村，营长便住在王江家北屋。那时，村民杜英家是救治伤员的地点。经过多日残酷激烈的战斗，阻击部队伤亡很大，伤员安排在关帝庙，副营长负伤后在杜英家疗伤，一位连长战死后被抬到了杜英家。在部队请求下，杜家同意将为母亲做好的一口



棺材用来安葬牺牲的连长，坟墓就选在村南场院附近的核桃树下。由于多年雨水冲刷，后来那位连长坟中的棺木都露了出来。

母亲曾对他说：仗打得正紧的时候，骡子队驮来了一批军需给养，有牙刷、牙粉、毛巾，还有成箱的子弹。但打开子弹夹以后，听见营长跳着脚大骂。“这仗怎么打呀！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子弹都是假的……”人们上前一看，原来子弹夹里填装的竟是秫秸秆……武器落后，弹药缺乏，新兵训练不足，中国军队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对抗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

母亲告诉王江：中央军很多是从南方来的学生兵，说话听不懂，没经过什么训练，仅凭一腔热血参军，在前线被炸死、打死的很多，根本来不及埋葬，更别说棺材了。所以，仗打完以后，山上尸体被狼叼狗啃，乃至腐烂发臭，下雨后污染了山水。而村民饮用山水后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症——说话口音大变，分明有了江南腔调。于是，迷信的村民便说这是死去的中央军冤魂不散、无法回家所致。于是，雨季刚过，村民们便糊了许多小纸船，一边烧纸念叨，一边将纸船放到村南小河：“中央军，你别烦，坐纸船回江南；中央军，你别哭，坐纸船见父母……”纸船顺流漂走，带走了村民的心愿、祈祷与寄托。果然，时隔不久，村民的病症便消失了。

凤凰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那位中央军营长就是仵德厚，那位受伤的副营长就是赵志道，那位牺牲的连长便是埋葬在上店村南场院旁的三营七连连长……



80多年过去了，但凤凰山上仍能见到那场战斗留下的悲壮遗存。时常能在山岭草坡中看到人的头骨和大腿骨，山岭上还残存着多处重机枪的环形阵地遗迹。

“鬼子刻”是日本鬼子占领凤凰山后留下的石刻。该石刻位于凤凰山二峰东北一点，南临中和峪吉祥寺，东北为王禅洞，坐西南朝东北，面积约1平方米，通体为青色，表面有黑色硫化物。虽风化多年，但字迹仍较清晰。上书“七八一、伍藤山、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共15字，分竖排四列凿刻，“占领”二字稍大。石刻处视野开阔，能俯瞰整个山谷和东面山梁。

开始，有人猜测石刻是用刺刀刻成。但经石刻专家刘卫东鉴定，该石为“铜青石”，选择用它刻字是较内行的行为。从刀工手法上看，也并非传言所说用刺刀刻成，而是用鑿、锤子等专业工具完成。汉字有印刷仿宋体味道，须先设计摹勒到石上后方可再刻，不可能是刺刀草率所为。

刘卫东认为：“七八一”或许是这支日本部队的番号。“伍藤”可能是侵华日军部队首领名姓；日军占领凤凰山后，便把这里称作“伍藤山”（因日军有用部队长官名姓命名山峰的习惯）。“昭和”则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年号；“一二八二九”则代表时间，即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37年8月29日。“占领”则是为了显示“记功”。

凤凰山上的石刻，应是侵华日军受其狂傲情绪驱使所为。从石刻时间和内容推断，8月29日，正是侵华日军击溃池峰城部和件德厚部并占领凤凰山的日子。这之后，京西房山县城便



失去了战略屏障，并很快陷落。

80多年前的这处石刻，不仅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也必将成为一处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实物；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次阻击战的惨烈和中国人民面对强敌血战不屈的精神。



战斗在门头沟矿区的房山地下党员

张起林*

门头沟矿区的采煤业历史悠久。到了近代，随着一批近代煤矿的出现，这里成为北京产业工人的重要聚集地，四面八方的人到这里从事煤业的生产活动。门头沟区与房山区山水相连，很多工人来自房山地区。中国共产党重视门头沟矿区的工人运动，很早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战斗在门头沟矿区的房山地区地下党员，进行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地革命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矿区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派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北京大学学生王复生，到门头沟矿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点燃起革命的火种。1927年初，在门头沟建立了特别党支部。20世纪30年代初，门头沟矿区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党领导矿工开展了“为增加抚恤金”“反对给工人洗冷水澡”等罢工斗争。来自房山地区的工人们积极参加了这些活

* 张起林：京煤集团教育培训中心原党委宣传部长



动。1933年10月7日，门头沟地下党出版的《矿工小报》的标题写道，“房山的老乡干的真有力”，报道来自房山的十几名矿工与矿警坚决斗争的事迹。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来自房山地区的矿工与门头沟的广大矿工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门头沟煤矿地下党员傅进山，先后动员30多名矿工，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其中有5名是来自房山的矿工。1943年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党在门头沟矿区的工作开始进一步发展。

谢甫志，房山区长操北直河村人，1942年入党，1943年任村干部。1944年初，受中共宛平四区区委派遣到南窖矿区车子煤矿任经理，以职业为名开展地下工作。他在矿上，通过到井下了解情况等形式，与工人交朋友，发展了10余名工人为地下关系，为发展党员做好准备。

1945年1月，谢甫志受党组织派遣，带领南窖地区的10几名工人到门头沟矿区从事地下工作。门头沟矿区是敌占区，各大矿有日军把守，他们只得在小煤窑以背煤为掩护开展活动。这里生活很苦，但他们坚持地下斗争。谢甫志在三义煤窑打磅，发展了7名工人入党，他们是胡广、霍凤河、史光四、陈泉、李树河、李树印、史先瑞。这时的矿区形势很紧张，敌伪发现在门头沟有共产党活动后，不仅在各大矿，而且在小煤窑集中的圈门地区，几乎天天搜捕共产党。他们被迫转移到孙桥附近一个小煤窑，谢甫志背煤，李树印当掌头，他们住在圈门里后



台的王家店，继续开展地下活动。特务经常到店里搜查，店主不让他们住了，他们只得到孙桥北坡的一座破庙居住。1945年5月，八路军解放了南窖地区，党派谢甫志回到南窖地区，任区政府抗联主任，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4年10月，新成立的中共冀察区域工部派遣黄亮到门头沟矿区开展工作。黄亮在门头沟建立了“平西工作团”，统一领导门头沟矿区和长辛店的城市工作。其中参加工作团的有房山的梁巨学、隗永厚、杨国森三位同志。

梁巨学，长操人，1938年入党。1941年到阜平石家镇接受培训。1943年初，党派他到南窖矿区做地下工作，半年后又派他到门头沟矿区做地下工作，在“平西工作团”的领导下，开展小窑工人工作。隗永厚，长操人，1939年在家乡加入党组织。1944年，受中共宛平县四区区委派遣到门头沟，在“平西工作团”的领导下，做圈门里小窑工人工作。杨国森，房山大安山人，抗战后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任班长，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回到家乡。1944年10月，他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在中共平西工作团领导下，在门头沟圈门一带的小煤窑开展地下工作。梁巨学、隗永厚、杨国森三人，在门头沟发展了多名工人入党和地下关系。同时，这几名同志又分别在自己的家乡大安山、长操等村发展了多名小窑工人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在门头沟矿区、潭柘寺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帮助矿区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

赵明，房山县水峪村人，1940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并入党。



后在房（山）良（乡）联合县三分区民运部和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工作。1944年，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他到门头沟天昌厚粮店建立了秘密交通站。门头沟矿区的西部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东部是日伪统治华北地区的中心——北平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何在天昌厚粮店建立交通站呢？赵明的哥哥赵兴，经常从房山县老家到门头沟卖羊肉，结识了当时也是房山人的天昌厚粮店经理赵全恒，天长日久，他们成了朋友。赵明通过哥哥，以老乡关系进入该店工作。赵全恒又花钱托人并出具铺保，给他办了“良民证”。从此，赵明利用粮店采购员的身份有时到北平，还有时去根据地，为我党搜集和传送情报。他主动结识门头沟煤矿伪矿警所长和门头沟的伪镇长等上层人物，为交通站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他机智勇敢，多次从北平城里接送党的地下人员和进步人士，顺利到达根据地。特别是在1945年的5月，他一次从北平城接送了10名受到敌人通缉的北平医学院的大学生，经过千难万险，把他们安全送到了根据地，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重新统治了门头沟矿区。中共平西工作团将梁巨学、杨国森、隗永厚等一批党员关系和王雨三等一批城工关系交给了新成立的门头沟工委（对外称职工会）。在门头沟工委的领导下，房山地下党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们在工委接受培训后，工委任命杨国森为圈门一带小煤窑的支部书记，任命梁巨学与工委宣传委员于文新一起领导小窑支部和零散党员的工作。工委书记



张鸿舜单独与梁巨学谈话，布置工作。小窑的主要任务：一是做好宣传工作，宣传共产党领导工人闹翻身、求解放的思想；二是搜集敌人据点及活动情报；三是团结进步工人，发展党员，扩大小窑支部组织。

王雨三是长操人，是我党在门头沟多年的城工关系，经过锻炼与考验，具备了党员条件。通过杨国森和杨玉水带他到冯村工委进行学习培训后，由杨玉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王雨三入党后，工委派他回门头沟，任圈门外的小窑支部书记。王雨三在小窑以工人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1946年7月，王雨三调到良乡县委城工部工作后，由隗永厚接任小窑支部书记。隗永厚介绍陈克秀等多名小窑工人入党。陈克秀在城子地区的大兴窑走窑，培养了房山县佛子庄村的五六名工人积极分子，后发展为党员。梁巨学以小窑工人的身份为掩护，深入到各小煤窑开展建党工作。同时，他还经常回到老家长操、金鸡台、大安山等地发展党员，然后派他们到门头沟矿区做地下工作。他发展的史福连、高福生二名党员，到门头沟后努力工作，建立了两个支部。

在梁巨学等房山地下党员的积极努力下，门头沟矿区小煤窑的地下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1946年春，中共门头沟工委任命梁巨学为小煤窑地下党总支书记。总支下辖6个支部，支部书记全部为房山人，即大安山杨国森支部、北直河郑修岐支部、堂儿村高福生支部、长操隗永厚支部、大安山张士祥支部、堂儿村史福连支部。以上支部分布在门头沟圈门里、圈门外和



城子地区的小煤窑，每个支部党员少的3人，多则5人。他们以背煤、看锅伙为掩护，开展建党工作，发动更多的工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946年2月底，国民党第16军325团驻防门头沟后，加紧了对地下党的镇压，矿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员被敌人追捕，一些党员被迫回了老家。门头沟工委机关转移到外十三村的冯村。但不久外十三地区的反动头目刘玉保，投靠了国民党部队，成立了还乡团，到各村搜捕共产党。6月6日，他们抓捕了距冯村东部2公里的上岸村中心小学校长、地下党员谭杰。在此严峻的形势下，门头沟工委代理书记李长顺决定工委机关马上转移到里十三村。

杨国森是门头沟小窑支部书记，不知道工委机关转移的消息，6月17日，他带领地下党员杨玉水、杨玉春从门头沟出发，穿过东辛房敌人据点，走大峪沟、葡萄嘴，到了冯村路口，发现有便衣人员，以为是游击队，实际是还乡团的特务。敌人问他们：“到哪里去？”杨国森没有识破敌人的阴谋，便说：“去职工会。”几个便衣特务一拥而上把他们捆绑起来，押解到了村公所。还乡团的一个人指着杨国森说：“这个人我认识，他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里的头。”敌人如获至宝，先是威逼利诱，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交出职工会的名单，交出门头沟地下党的名单，我们可以马上放了你们，还给你们重赏。”但杨国森等大义凛然，不屑一顾。敌人对他们大搞刑讯。他们受尽折磨与摧残，但严守机密，始终未说一句话。敌人又将他们押解到



栗园庄大乡，这里的敌人更残暴，实行法西斯手段，把杨国森吊在大庙横梁上，严刑拷打、灌煤油水、辣椒水，但杨国森强忍敌人的折磨，始终严守机密、坚贞不屈，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

面对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残暴的敌人开始了大屠杀。敌人进攻冯村后，派特务抓捕了中共宛平六区委员杨运亭、地下党员杨占元等人，押解到栗园庄大乡关押刑讯。在这里先后关押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0 多名，敌人决定杀害他们。6 月 18 日白天，还乡团派人在村南头的黄土坑挖了 6 个深坑，以此为杀人刑场。晚上 9 点钟，国民党军队负责站岗放哨维持治安，还乡团负责押解杨国森、杨玉水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刑场。刘玉保下令：是共产党员的活埋，是共产党干部的枪杀。几个还乡团士兵让谭杰站在坑里开始活埋。谭杰在敌人一边填土时一边往上蹿。还乡团正在执行时，不远处突然传来枪声，敌人害怕游击队袭击，所以没来得及检查就收兵了。结果被活埋的谭杰和被枪杀的杨玉水二人死里逃生。谭杰用身子拱土慢慢出了土坑，跑到苛罗坨村，被村民救下，送到了解放区。企图杀害杨玉水的敌人，由于害怕，子弹打歪了，杨玉水倒下了并没有死，也逃生了。与杨国森、杨玉水同时被捕的杨玉春，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是煤矿工人，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无计可施，一敌副官把他带走了。杨玉春逃出敌人魔爪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 年夏天，中共宛平县大队一举消灭了外十三刘玉保



的还乡团。12月15日，门头沟矿区获得全部解放。12月17日，解放军平西军分区成立了门头沟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于组织上采取各种隐蔽办法，保护地下党，使小煤窑党支部大部被保存下来。门头沟矿区小窑党总支部书记梁巨学，亲手将北直河郑修岐支部、堂儿村高福生支部、长操隗永厚支部和堂儿村史福连支部党员的名单交给了军管会。门头沟矿区的房山地下党员，坚持到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平西矿区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北京市周口店区的设立与撤销

张长路*

1958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河北省房山、良乡两县划归北京市，两县的行政区域合并设立北京市周口店区。

一、周口店区成立的历史背景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时的北平城区，面积不足百平方公里，划为12个区。尽管城区外围还分布着8个郊区，大体也只相当于如今朝阳、海淀、丰台的大部分地区。

为服务中央，给首都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空间，给北京所需物资，特别是生活物资的供应提供可靠保障，原属河北省邻近北京市的各县被陆续划归北京市管辖，这其中就包括房山县和良乡县。北京市不断扩容，逐渐形成现有的规模和格局。

* 张长路：房山区良乡中学教师



二、周口店区设立前后的辖域变化

1952年7月23日，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及房山、良乡两县部分区、村[房山县河北、周口店一带50个村（一说是75个村）；良乡县北车营等3个村]划归北京市管辖，与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北京市第十六区）合并组成北京市京西矿区。京西矿区位于北京老城区西郊，主要产煤。

1958年3月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2次会议通过，将原属河北省的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五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

1958年5月24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7次会议文件（议字第38号）批复，撤销房山、良乡两县建制，将原房山、良乡两县合并设立周口店区；另外，区与区之间的行政区划，又作了如下调整，将原良乡县的魏各庄、岗洼、稻田三个乡和羊圈头村划归丰台区管辖；将原京西矿区所属金鸡台、莲花庵、大安山、柳林水、长操、南窑、佛子庄、黄山店、周口店、歇息岗、坨里、河北十二个乡划归周口店区管辖。

1958年9月，周口店区废除乡镇建制，行人民公社制，全区设城关等8个公社。



三、周口店区设立前后辖域内人口变化

1957年，原房山、良乡两县总户数为67316户，人口325542人。1958年4月，良乡县岗洼、魏各庄两乡划归丰台区，户数减少4117户，人口数减少19632人。年底，京西矿区周口店、河北等12乡97村回归，增19846户，人口83335人。1958年12月20日统计：北京市周口店区共计有84152户，人口408205人，其中男性213000人，女性195205人。

四、周口店区成立后，原房、良两县部分单位合并

1958年春，房、良两县合并划入北京市后，经市委批准，李明任区委（第一）书记，刘永国、张令德、曹庶民、张革夫任副书记；曹庶民任区长，王新华、吕镒、刘增勤任副区长。这些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当地工作，都是两县干部群众熟悉的同志。

1958年3月下旬，良乡县直机关陆续迁至房山县城。4月1日，周口店区正式成立、挂牌、启印。区府设在原房山县县城。

（一）通往市区的“天桥—良乡—房山”公交客运线开辟，每天4—5次班车，可载客100多人。公交车从房山东关出发，经良乡开往天桥车站，只有京周路一条线路。京周公路是房良境内第一条柏油路，1955年11月告竣，是当时全国第一条机



械化施工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路。

(二)房、良乡县邮政局合并成立周口店区邮电局，由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划归北京市邮局领导。1958年建立南坊邮电所、大安山邮电所、史家营邮电所、张坊邮电所、长沟支局。1959年10月1日，北京市邮局批准撤销周口店区邮电局，成立房山县邮电局，局长祁冬喜，副局长王同进、刁成波。开辟了房山至琉璃河、房山至张坊的摩托车邮路，架设了由房山至各乡的电话线路，接办了由县委管理的机要通信工作。

(三)房、良两县文化馆站合并，改名为周口店区文化馆，原良乡县文化馆、周口店文化馆改为文化站建制。合并以后全区有区文化馆一处，有文化站五处(良乡、周口店、河北、长沟、霞云岭)，文化馆站干部总计15人。是年秋天，先后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北方昆曲剧院、北京曲艺团、北京电影公司、中国评剧院、北京画院、北京幻灯制片厂等八个文艺团体三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到房山来，深入到当时的八个人民公社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普遍开展诗画满墙和大唱革命歌曲活动。

(四)房、良两县卫生防疫站合并，称周口店区卫生防疫站。全站有宋进财、王洪星、李春兰、张殿权、李金符、陈祥、袁景荣、肖荣祥、赵城五、苑宝鑫、阎作桢、王国范、高佩海、徐凤祥、高福忠等15名工作人员，宋进财为站长。卫生防疫站(以下简称防疫站)与人民委员会(即政府，以下简称人委)卫生科合署办公。地址在房山城内西街路北，人委前院和中院之间的过道门两侧，东侧两间平房为人委卫生科办公室，西侧



两间平房为防疫站办公室。宿舍在人委中院西侧平房内。1958年第四季度,宋进财去长沟筹建坟庄卫生院,因此防疫站长空缺。

(五)房、良两县粮食局合并建立周口店区粮食局,局址设在房山城南,京周公路北侧,局长王毓华。区局机关下设8个股室,包括秘书室、人事股、保管股、业务股、财会股、工业股、计划统计股、农村购销股(即政府粮食办公室)。建区粮食局之初,全区基层单位33个,包括草站、油库、良乡直属库、琉璃河库及27个中心粮站、购销站。1958年6月,原京西矿区坨里粮食管理小组及坨里、周口店、柳林水三个中心库划归周口店区粮食局。1960年2月,随着撤区建县,周口店区粮食局又改成房山县粮食局。

(六)1958年4月20日,正式成立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法院。院址在房山城内城隍庙街路南,租用赵家院21间平房。6月22日至25日,周口店区第一届(后改称房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谭万林为法院院长,李春青为副院长,张毓秀任秘书。原房、良两县法院及京西矿区周口店法庭干警共29人,合并后少数人调出,定编24人。周口店区法院下设良乡、河北、张坊三个法庭。除良乡法庭有固定办公地点(良乡城内西大街路南,原良乡县检察院院内)外,河北、张坊法庭无固定办公地点,是实际上的巡回法庭,直到1965年,在张坊村租用三间民房作为张坊法庭办公地址。1959年夏,将法院东侧原城关公社西街第二生产队饲养院划给法院,新建9间平房。1960年1月,国务院决定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2



月2日，周口店区人民法院改称房山县人民法院，2月5日启用新印章。



1959年9月30日，周口店区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合影

五、周口店区的定名过程

对于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后新区政府的选址和新区定名为周口店区的过程，原房山县政协主席张本荣有非常详尽的回忆。

1958年3月下旬，北京市委办公厅召开一次办公会议，通知房、良两个县各去一人参加。房山县是隗永树同志去参加的（原房山县委副书记，合并后为区委组织部长），良乡县是张本荣去参加的（当时任良乡县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合并后为区委办公室主任）。因刚划给北京市，他们俩对北京市的与会人员都不认识。会上只给他俩介绍了市委副秘书长孙分山同志及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同志。这次会议虽然是定区址和名称问题，但并未讨论，只是由李明同志谈了一下设想。他说，



区址如果设在良乡，有利方面：一是有电了（当时通县专区所有县仅通县、良乡两个县通上了电，其他县还是油灯照明，房山是合并后 1958 年 5 月才通电）；二是交通方便；三是靠市里较近。但合并后山区面积较大，区址设在良乡未免太偏了。李明同志当时是通县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房、良合并后任区委第一书记），大家对他的意见都很尊重，并没有任何争议。不过区址和名称问题两个县都很关注，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处理妥当。会上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同志宣布了这样的决定：房山、良乡合并建立的区不叫房山区，也不叫良乡区，周口店在世界知名，叫周口店区。区址暂时设在房山城内。周口店区，从 1958 年 4 月正式设立到 1960 年 1 月被撤销，仅仅存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1959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将本市远郊几个区改为县的建制的请示》【（59）市万字第 129 号，1959 年 6 月 20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报请国务院批示。请示内容显示，1956 年 2 月和 1958 年 3 月，经国务院决定将原河北省的昌平、通县、大兴、顺义、房山、良乡六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后，北京市根据当时情况，调整了行政区划，并将上述六个县一个市改为昌平、通州、大兴、顺义、周口店五个区。1958 年 10 月，经国务院决定，将原河北省的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四个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后，仍然维持县的建制未变。北京市认为，上述先后划归北京市所辖的区、县当时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行政区划一



般也没有大的变更，为了便于领导、便于工作，建制应当统一起来。为此，北京市拟将昌平区改为昌平县、通州区改为通县，顺义区改为顺义县、大兴区改为大兴县、将周口店区改为房良县。改变建制后，除将大兴区所属红星人民公社划归丰台区管辖以外，行政区划不变。

1959年8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给内务部发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将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的函》【（59）市厅秘字第170号】。该复函内容指出，关于将北京市昌平区改为昌平县、通州区改为通县、顺义区改为顺义县、大兴区改为大兴县、周口店区改为房良县，内务部认为房良县的名称，应另加考虑的问题，经研究，北京市拟将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

1960年1月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93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设立北京市昌平等县的决定》（议字3号），决定设立房山县，撤销周口店区，以原周口店区的行政区域为房山县的行政区域。1月14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关于设立北京市昌平等县的决定》【（60）市厅星字第2号】。

1960年1月27日，周口店区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自1960年2月1日起，正式建立房山县。



参考资料：

1.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行政区域变动史料选，《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001期，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2. 《北京市房山区志》，北京市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第1版。
3. 《房山文史选辑·第七辑》“房山人口演变”，张东升、王培秀。
4. 《房山文史选辑·第十三辑》，在中共房山县委工作的回顾，罗玉源。
5. 人口姓氏流向探源，木犀，在门头沟的版图上：沿河城，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1995年。
6.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战斗在永定河北，彭城，门头沟文史·第二辑，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年。
7. 《房山文史选辑·第六辑》“五十年代的房山群众文化工作”，段汝连。
8. 《房山文史选辑·第三辑》，房山区医药发展简史（二），袁景荣。
9. 《房山文史选辑·第二十一辑》“建国后房山粮食机构的建立及发展”，康富。
10. 《房山文史选辑·第二十三辑》“忆国庆十周年游行”，张广文。
11. 《房山文史资料·第十辑》“房山邮政事业的初期发展”，王同进。
12. 《房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周口店区的定名”，张本荣。
13. 《房山文史选辑·第十二辑》“‘文革’前房山县法院人员、机构的变迁”，宋湘。
14. 《房山文史选辑·第二十三辑》“忆光辉十年”，宋湘。
15. 《房山文史选辑·第十九辑》“曹庶民县长二三事”，刘振祥。



关于南白岱抗日战争情况回忆

焦启超*

南白岱地处张坊地区，是京西南的一个小山村，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方圆几十里。

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三区，抗日活动非常活跃，抗日军民勇敢顽强，为这一代整个抗日活动做出了贡献。

早在1938年、1939年，我区就开展了抗日活动，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唤起民众，进行抗日教育活动。1939年，区委书记杨流萤在南白岱村召开了相当规模的群众大会，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不分党派、地主富农，民族信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反对投降，誓死不当亡国奴。

与此同时，邓华领导的三十二、三十三大队八路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我村开展了抗日活动。大队长张奇他们在吕益之（李铁林）家连续召开了两次青年积极分子座谈会。我村到

* 焦启超：房山区工商联原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



会者有高凤岐、邱少明、焦鼎章、吕炎、吕志祥、宋玉文、吕伯雄等十几个人。第二次座谈会有二十多人参加。从此，抗日活动在我村开展起来。

支部书记邱少明、村长佟伯文主持工作。区委晋平臣、付兴远常驻我村，指导我村开展抗日活动。村里地下党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有多少党员、谁是党员，谁也不知，党的组织是秘密的组织。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了青、妇、武组织，开展抗日活动。青年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妇女组织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放足剪发，支援前线，做军衣、军鞋、军被，慰劳前线的战士；武装组织搞破交工作，夜晚跑上七八十里路到周口店一带，破坏敌人的交通，拆敌人的铁路，剪断敌人的电话线，配合前线打击敌人。

1940年，我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了男自卫队、女自卫队。每天坚持操练，大唱抗日歌曲。当时下乡干部白岩、王新、苏时珍三位同志教我村妇女唱歌、操练。特别是妇女每天担负支援前线工作，还要坚持练操走步，正步走、齐步走、原地踏步。刚刚放开足的两只小脚走路都不得力，为了求解放，妇女们不怕困难，坚持操练，受到了区里的表扬。区里秋前检阅时，南白岱村妇女自卫队荣获第二名（镇江营村是第一名，早期孙中山在村里组织了学堂）。训练好的男女自卫队到各村去游行，宣传抗日、鼓动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向往来行人查路条。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抗日热情在本区蓬勃兴起。



1940年秋，日本鬼子先后两次对我区进行了疯狂的秋收大扫荡，奸淫烧杀，摧垮了我村的各个抗日组织，革命工作转入了地下组织，南白岱村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冬季，小日本占领了塔照村安下据点，不断到各村骚扰、搜索八路军、共产党员，在北白岱、王家磨设下岗楼。1941年，又在张坊设了据点。

在革命形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上级指示：坚持斗争，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要按党的指示，把抗日工作做下去。

1940年，我才15岁，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在村妇救会当助手。姐姐郭旭光（郭琦清）、焦翠峰同志担任妇救会正副主任。抗战高潮时，我们组织妇女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在革命危急关头，村干部有的被调走，有的自行退缩逃脱。我和姐姐一直坚持到底，开展对敌斗争。

县妇救会领导白岩、李林、于彬三位女同志，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封锁沟，来找我们秘密指导工作，传达上级指示，给我们布置任务。当时，我们在焦怀中的奶奶（侯玉芬）家的大南屋，这里是抗日的活动中心。白岩同志把我们几个进步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救亡小组”，人员有郭旭光、焦翠峰、郭晓亭、侯玉芬、焦月森等人。她教我们唱歌，布置抗战任务，让我们搜索敌情，散发抗日传单。母亲董桂珍也非常支持我们的革命工作。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经过几年的战争浩劫，



百姓生活饥寒交迫，柴米油盐除几户不缺吃少穿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全村百姓把树叶吃光，时常还有中毒的，脸上起疙瘩。日本帝国主义不顾人们的死活，他们在塔照纠集了各种伪组织，如大编乡、维持会、维持佃、新民会等特务组织，向老百姓摊派粮食和钱财，到处抓壮丁，抓不着壮丁就抢百姓的东西，抢不着东西就×××。老百姓吃不上一顿饱饭，苦不堪言。

终于盼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胜利了，我们彻夜难眠，无限感慨、无限喜悦。

注：本文口述者郭晓亭，女，1925年生，中共党员，原工作单位为房山县妇联会；笔录者焦黎英为郭晓亭次女。

此文由原笔录手写稿转录，稍显遗憾的是，手稿最后一页右下角残缺，五行文字都只有少半行，成稿时间也无从知晓。但从内容上看，成稿时间应是口述者70岁之后。



八路军侦察兵李田

陈广祥*

抗日战士李田，系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人，村民们都知道他当过八路军，却不知道他鲜为人知的故事。他那战场精彩的一幕，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李田本是否元村人，家住在上杏园山崖下，是一个苦命的孩子。聪明伶俐的李田，十几岁跟着叔学木工。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河南村，并修了炮楼，使村民无安生日子过。1938年春天，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李田，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八路军，来到了晋察冀独立团，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晋察冀独立团团团长杨成武，高大魁梧，威震敌胆，李田由衷的佩服。这位木匠出身的小伙，虽然不满18岁，个子不高，身材有些消瘦，却机智勇敢。李田被分配在独立团二营，给营长当勤务员。一天，他看到侦察排长手提驳克枪很神奇，便投去羡慕的眼光。才当了几个月的勤务员，又梦想去当侦察兵。

* 陈广祥：新华保险房山支公司原业务经理



排长回头看李田，两只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给排长留下深刻的印象。排长问李田：“为什么想当侦察兵？”李田回答：“我就要去杀鬼子。”说着说着，眼圈有些湿润。于是，李田讲了一件伤心的事：

那是1937年秋天，李田跟父亲一起去辛庄姥姥家，路过河南村时，日寇的炮楼设有关卡，有伪军盘查，日本兵站岗。父亲说了一声：“这什么世道，还让人活吗？”居然遭到日本兵和伪军的毒打，后惨死在日本兵手里。从那时起，李田对日寇充满了仇恨，为此报名参加八路军。排长听了也非常愤怒，看李田报仇心切，又苦大仇深，心想，来侦察排也将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于是，在排长的再三请示下，李田来到了侦察排，当了一名侦察兵。

李田来到了侦察排，被分配在侦察一班。第一次和班长出去侦察时，心里特别高兴。那是初夏的夜晚，天上下着蒙蒙细雨，从斋堂清石口出发，夜间山路中，脚滑路远，他们头顶蒙蒙细雨，磕磕绊绊，必须在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了解情况。这次是与班长执行侦察任务，拂晓前来到平西的一个村庄。

他俩找到一个隐蔽地方，观察情况，老远看到两个炮楼，日本兵和伪军出出进进。这地方是平西的交通要地，炮楼里的日本兵经常到周边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八路军早就想除掉这两个炮楼。班长化装成一个买卖人，身穿了长袍，头戴礼帽，李田装扮成一个伙计，跟在班长的后面，俩人便走进这个村庄。

他俩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未发现敌情，也没有见到了解情



况的村民。这时，一个伪军小队长，衣冠不整晃晃悠悠从村里走来，嘴里还哼着小曲儿。李田冲上去，锁住伪军小队长的手腕。那个伪军小队长不知所措，来不及反抗就被李田瞬间制服。扭到一个没人处，班长迅速审问，了解岗楼兵力部署，火力配备。那个伪军讲完情况，感觉有些后悔，妄想反抗，班长说：“不能留下后患。”李田随手一刀，结束了伪军小队长的性命。

时隔一天，八路军独立团就拔掉了这两个据点。李田在这次战斗中，机智勇敢，跟班长一起，摸清了敌情，为八路军独立团提供了重要情报，受到部队嘉奖，并提升为副班长。

李田当了侦察兵，只有一年时间，后去了作战部队，在独立团二营三连当战士。李田苦练杀敌本领，枪法也打得准。李田拼刺刀也是一绝，别看个子小，比一般人要快上几秒。

在晋东平安阻击战中，李田表现出他的智慧和勇敢。在这次战斗中，他跳出了战壕，端着三八大盖枪，上面带着雪亮的刺刀，跟日寇单挑。他每刀都刺入敌人的要害，几个鬼子，被他几刀放平。在李田追赶退却的敌人时，只听“叭！叭！叭！”三枪，前面的两枪，李田都迅速躲过，可第三枪一响，李田的右手被子弹穿透，鲜血瞬间染红了枪把。

李田受了重伤，被送到八路军野战医院住院治疗。在八路军野战医院，他坐立不安，一心想杀鬼子，盼望伤势快好，早日归队。可后来伤势恶化，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仍不见好转，从此落下了残疾。一年之后，李田含泪离开了部队。李田作为二等乙级残疾军人，复原回到了家乡，成为当地的农民。



在农村，他跟社员们一起出工，干着农业社的活。入伍之前，跟他叔学过木匠。右手虽然受了伤，有些影响干活儿，他仍然把木工这个差事重新拾起来。

李田有立功奖章，有参战纪念章，有察哈尔军分区颁发的退伍证，还有立功喜报，这些都是他用生命换来的。李田是一名残疾军人，他完全可以享受国家的照顾，但李田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里。

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李田永远地离开了，而李田抗日的经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诱敌跳崖的英雄张凤田

潘希凤^{*}

1947年，良乡县佐公署三区（河北镇地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土地复查和清算复仇斗争，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此时，以河套沟大地主殷耀东为首的反革命地主武装——还乡团盘踞在坨里一带，时刻妄图夺回失去的政权和土地。于是招兵买马、购买枪支弹药，疯狂地向解放区进犯，多次向磁家务、河北、佛子庄等村庄发动武装进攻。面对敌人的烧杀抢掠，解放区的军民按照县佐公署“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方针，充分运用游击战、地雷战、运动战，有效地粉碎了还乡团的进剿，狠杀了他们的反革命气焰。

一天，三区武装部长张凤田带领民兵在磁家务村附近执行任务。下午时分，民兵完成任务回撤时不巧遭遇了坨里还乡团。双方立刻交上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敌人越来越多，

* 潘希凤：房山区佛子庄乡退休干部



民兵边打边退，不一会儿，就被敌人的火力压到一个院子里，一时间难以突出包围。

张凤田原是长操村的民兵队长，几年来，他带领民兵站岗放哨，抓捕汉奸特务，配合解放军参加过不少次战斗，是一个斗争经验丰富的指挥员。面对敌众我寡、又无援兵的情况下，他沉思片刻，冷静地说：“沉住气，节省子弹，我从正面吸引敌人，大家见机行事，从后墙突围。”说完，他掏出手榴弹，看准时机，向敌群甩了出去。借着手榴弹爆炸的浓烟，几个箭步冲向前门跳出院子，沿着村外河滩的柳树行子边打边向西南跑去。还乡团见有人从村里跑了出来，急忙追了过来。为了更好地吸引敌人，他索性一口气跑到了河东村对面的南大岭。这时有人认出张凤田，急忙报告了还乡团的头目。还乡团头目大喊：“抓住他！他叫张凤田，是武装部长，抓住他赏十块大洋。”于是敌人迅速地围了过来。

这时，被围困在院子里的民兵趁敌人火力减弱，跃出后墙，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从村里传来的枪声判断，张凤田得知民兵已经突围，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张凤田停下来喘口气，朝四处一看：坏了！还乡团围过来了，想往西南撤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边打边往山顶撤。不一会儿，还乡团将张凤田围在山顶上。他们见张凤田子弹打光了，身后又是悬崖绝壁，无路可退，便开始劝降。还乡团头目说：“姓张的，投降吧，跟我们一块干吧，凭你的职务能当个团副，吃香的喝辣的，比你现在强多了！”面对敌



人的诱降，张凤田大声骂道：“叫老子投降，做梦去吧！”只见他虎目圆睁，大吼一声，纵身跳下悬崖。

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将在场的还乡团全都吓傻了，各个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还乡团一窝蜂似的涌向悬崖顶，边找边喊，没有什么发现，便七嘴八舌议论开来，这个说：“这么高，肯定摔死了。”那个说：“摔个半死不活掉下深潭也是淹死。”还乡团头目抬头看到太阳快要落山了，他知道这时候谁也不会再冒着危险下山崖去寻找张凤田，于是就命令朝悬崖下开枪，见许久都没有动静，只好无奈地吹响收队的哨子。还乡团垂头丧气地下了山，撤回了坨里。

这天近午夜时分，有人给长操村捎过来信儿，说张凤田被还乡团追到河东村对面的南大岭跳崖摔死了。得到这个消息，张凤田一家悲恸欲绝，老母亲一时背过了气。村里干部知道这个消息，也来到张凤田家。一方面安慰家属，一方面商量如何组织人员寻找尸体、准备棺木。

第二天早晨，张凤田母亲和妹妹正在预备干粮、收拾东西，准备去河东南大岭。就在这时，院门忽然开了，进来两个人。张凤田妹妹一眼就看见其中一个人是哥哥，吓了一跳，冲着母亲喊：“妈，哥哥回来了！”母亲听到喊声抬眼一看，愣住了，那个高个头的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她擦了擦眼睛，颤声道：“你是凤田吗？”“妈，我是凤田！”张凤田答应道。母亲“哇”的一声哭着扑了过去，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原来张凤田跳崖后，被半山腰的一棵黄栌树挂住了，他紧



紧抓住了树干。恰巧树旁有一个凹进去的崖面，他把身体紧靠在崖面下，还乡团看不见，子弹也没打着。待还乡团撤退后，突围的民兵来到山上边喊边找，听到张凤田的回应后，用绑腿将受伤的张凤田救了上来。只见张凤田满脸是血，浑身是伤，大家难过极了。

区里领导听了民兵们的汇报，又难过又高兴，在场的干部感动得掉下了眼泪。鉴于张凤田的伤情，区领导决定派人送他回家养伤，于是便出现了母子相见的感人场面。

张凤田为掩护战友突围，舍身跳崖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石河两岸，人们奔走相告，称他是又一个活着的“狼牙山五壮士”。新中国成立后，张凤田同志多年在外地工作，后来调回北京通县。1999年因病去世，终年79岁。

